

評介孫著「鄭觀應」

林麗月

書名：鄭觀應（收入「中國歷代思想家」第八冊）

作者：孫會文

出版者：台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地：民國六十七年五月 台北市

頁數：三十五頁，另附參考書目一、照片二

一、前言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我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勢一落千丈，西力的衝擊使傳統政治社會結構遭到空前的挑戰，如何調適因應以謀圖存之道，遂成晚清政治的一大課題，自同光之際的「洋務運動」到光緒年間的變法維新運動，即是晚清中國在西力衝擊下掙扎調適的一段艱苦過程，而當代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應變之方，也先後在這兩個運動中作不同的展現。鄭觀應是晚清提倡變法維新的知識分子之一，與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陳熾、何啓、胡禮垣等人同為清末維新運動理論上的先導人物，而作為一個洋行買辦出身的知識分子，鄭氏在提倡變法的思想家之中，實具有與眾不同的時代色彩，因此，探討晚清變法思想，鄭觀應自是一個極富時代意義的研究對象。

近人有關鄭觀應變法思想的研究，國內尚無一部專書問世，以鄭氏生平及思想為主題的論文亦寥寥可數，較早的僅有胡秋原於民國五十四年為重印盛世危言所撰之「鄭觀應之生平及其思想」，最近的亦只有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研究生范振乾的「鄭觀應的改革理論（一八六〇—一九一一）」，以及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所收孫會文的「鄭觀應」，其中范文係打字本的碩士論文，迄今尚未出版，孫撰「鄭觀應」自為關心鄭氏個案研究者值得注意的新作。是以本人擬就孫氏此文之內容作一簡介，並試就其方法與論點加以評論，以見孫氏「鄭觀應」一文之梗概及其疏失，或可為關心鄭氏思想者之參考。

二、內容簡介

本文分為八個小節，第一小節「鄭觀應所處的時代」，作者以鴉片戰後的西方衝擊為經，因應而生的改革運動為緯，以見鄭

氏思想的時代背景。鄭氏生於清道光廿二年（一八四二），卒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正是近代中國急劇變動的時代。作者在本節略述英法聯軍之役後的「洋務運動」以及中日甲午之戰後變法維新運動的形成背景，並指出這兩個運動各有理論上的先導人物，就洋務運動而言，其改革理論的先導人物有林則徐、龔自珍、魏源；就變法維新運動言，其思想先驅有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湯震、陳熾、陳虬、何啓、胡禮垣等人，作者認為，在這些改革理論的先導人物之中，鄭觀應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第二小節「鄭觀應的生平」，作者以一千五百字左右（三頁）的篇幅，簡述鄭氏由勤習經史的秀才成為洋行買辦到清季多項「官督商辦」企業的協辦，並投資經營各種新式工商業的過程。

第三小節「鄭觀應的著作」，作者分別介紹鄭氏所著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後編、海行日記、南遊日記等書的性質及其成書年代，其中最能代表鄭氏思想的著作是盛世危言，係鄭氏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三十餘年間留心時務的結晶，作者對此書由初步完稿以至正式刊行及增訂新編的情形作了較詳細的介紹。

第四小節「晚清變法思想演化中鄭觀應的地位和他的思想淵源」，作者分別討論了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龔自珍、魏源，及六十年代的馮桂芬的改革思想，指出：「變法」和「學習西方」是魏源思想的兩大支柱，但十九世紀中葉時，兩者係平行發展，並未合而為一，至馮桂芬始將這兩個概念初步加以結合，到七八十年代的王韜、薛福成、鄭觀應、陳熾等人，進一步結合了變法、學習西方和西方政治制度的認識，鄭觀應即為「這些主張改革變法思想家中相當強勁的一位」（頁十五）。至於鄭氏的思想淵源，作者指出，其思想形成受了多方面的影響，包括和中外友人的討論、閱讀中外論著、遊歷考察列強的殖民地等。

第五小節「晚清變法論範疇的演化與鄭觀應的道器論」，作者首先討論晚清變法範疇演變的過程，亦即「可變」與「不可變」的範圍的問題。作者指出，中日甲午之役前後的變法思想家，吸收魏源的「道勢論」，馮桂芬的「本輔論」，與盛行一時的體用說，並揉合自古已有的道器觀念，創立了「道器說」。鄭觀應以為「道為本，器為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其所謂的「道」不同於「體用說」的「體」，而是儒家所說的「性命之原」和「天人之故」，鄭氏深信，孔子之道是不可變的常經，可變的是富強的權術，換言之，鄭氏的「道器論」是將「中體西用說」中不可變的政法制度，納入「器」的範疇，而成為可變的部份。

作者於第六、第七小節分別討論鄭觀應對民族經濟發展問題與西方議會制度及君主立憲政體的態度。鄭氏強調商務的重要，主張進行「商戰」以發展民族經濟的總指標，主張實行保護貿易的關稅政策，並准民間自辦企業，發展機器工業，發展近代交通事業並鼓勵開礦，以西方的機器與方法改進農業生產。在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作者指出，鄭觀應是第一個明確主張在中國建立議會的改革派思想家，早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的「易言」中，鄭氏已提出設「議政院」的主張，及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撰盛世危言時，更進而主張採行君主立憲政體，亦即他所謂的「君民共主」「君民平權」的政治。

第八小節「鄭觀應改革變法思想的影響」，作者指出，鄭氏前承龔自珍、魏源、馮桂芬的影響，後啟康有為、梁啟超等變法

論者，而由鄭氏所著盛世危言在清末流傳之廣，更可見其於晚清思想界影響之深。

三、評論

本文收入王壽南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思想家」第八冊，全文僅約二萬字左右，是該書所收各篇中字數最少的一篇。整體觀之，不論是作為專題研究的論文或以單行本行世的小書，本文都失之簡略，予人以急就章的印象。或許由於倉促成篇，文中所述鄭氏思想，頗多疏漏之處。茲就管見所及，試加評論於后：

(1) 關於鄭觀應的思想淵源問題：

作者指出，影響鄭氏思想的因素可分為三類：一、和中外友人的談論；二、閱讀中外論著；三、遊歷考察列強的殖民地。此種種因素於促進鄭氏改革思想之形成有相當大的作用，固為無須置疑的事實，然鄭氏本人豐富的商務經驗，自擔任洋行買辦、參與官督商辦企業，以至以私人身份投資各種新式工業，集三種不同的商人經驗於一身，此於鄭氏經濟的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之激發及其「商戰」理論之形成，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響。作者未就此一因素說明鄭氏變法思想之淵源，顯然忽略了實際經驗在鄭氏思想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

此外，鄭氏之前的改革思想家，如嘉道年間的龔自珍、魏源與咸同之際的馮桂芬等人對鄭氏變法思想均有若干影響。鄭氏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的「盛世危言自序」中揭櫫「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暢其流」三大目標，固然是鄭氏由比較中西利弊與尋求富強根本所得到的體認，但其中「人盡其才」、「地盡其利」兩個原則亦可能受到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中「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的啟發，進一步予以發揮而成。

再者，鄭氏的變法思想與其個人早年背景的密切關係，亦頗值得注意。鄭觀應於十七歲那一年（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因鄉試落第，始絕意功名，不久即赴上海習商，在此之前，鄭氏一向以研讀傳統經史典籍為業。鄭氏幼習經史的背景，即其改革思想的傳統基礎，直接影響鄭氏改革變法理論的辯證模式。故其後主張模仿西方政法制度，每自中國固有典籍尋繹其淵源。作者討論鄭氏的思想淵源而未能注意及此，殊為不妥。

(2) 介紹鄭氏生平與著作，宜就其思想之演變與形成作「分期」的分析：

作者似未充分利用劉廣京、郝延平等人的著作分析鄭氏思想演變的過程。劉氏「鄭觀應『易言』——光緒初年之變法思想」一文，以「易言」代表鄭氏早期之改革論，值得參考。台大政治研究所研究生范振乾將鄭氏改革理論的演變分為三期：①雛型時期——代表性著作為「易言」，下限定為光緒十年五月（是年鄭觀應奉派南行，刺探法越軍情）。②成熟時期——代表性著作為「盛世危言」，此書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三大原則，直至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重刊盛世危言新編，鄭氏的基

本觀念迄未改變。③補充階段——代表性著作爲「盛世危言後編」，書中所收文字包括同治元年至民國十年（一八六二—一九二一）間的作品，而以光緒二十六年以前早已完成而不曾在前述二書中出現的文章爲主。（註一）范文的分期，由於第三期的代表性著作「盛世危言後編」所收文字在時間上太長太雜，未能明確顯示出鄭氏第三階段的思想演變，故仍有尙待商榷之處，但以「易言」「盛世危言」分別代表鄭氏改革理論的雛型時期與成熟時期，則相當適切合理，值得參考。

（3）、關於晚清變法論範疇的演化與鄭觀應道器論的問題：

作者於本文第五小節討論晚清改革變法論「可變」與「不可變」範疇的演化，自魏源的「道勢論」至馮桂芬的「本輔論」和洋務運動時期盛行一時的「體用說」，到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變法論，「可變」與「不可變」的範疇經過逐步的調整，又出現了新的詮釋，此即「道器論」。作者指出，在同時期的變法論者中，「以鄭觀應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最具有代表性。」（頁一九）鄭氏主張「道爲本，器爲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其所謂「道」，亦即薛福成所說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及王韜所說的「孔子之道」。實則此種道器論爲同光之際變法論者共有的理論根據，由於資料缺乏，思想家之間的相互影響幾無脈絡可尋，因此殊難確定「道器論」由何人首先提出，鄭氏在同時期的變法論者中，對這一問題的分析是否「最具有代表性」，亦難斷言。作者作如此肯定的評斷，不知根據何種理由，文中並未有進一步的說明。

晚清知識分子對變法範疇的討論，涉及西力衝擊下思想家文化價值觀念的轉變及其對中西學術的態度，問題極爲複雜，作者經由道勢論、本輔論、體用說以迄道器論一系列的討論，對晚清變法論範疇的演化作了簡明扼要的分析，極爲難得，惜於鄭氏以「本末」「博約」「中外」「虛實」等觀念闡釋「道器」問題，作者一無所述。鄭觀應曾於「盛世危言」指出：

「昔我夫子不啻由博返約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驚格致諸門，如一切汽學、光學、化學、數學、重學、天學、地學、電學，而皆不能無所依據，器者是也。約者何？一語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歸中，正所謂由博而返約。五方具入中土，即同軌同文同倫之見端也。」（註二）

鄭氏以爲中學「約」、西學「博」，中學「中」、西學「外」，約者爲「道」，博者爲「器」，故其主張「由外而歸中，正所謂由博而返約」，實寓融合中西學術亦即中西政法制度爲一體之深意，鄭氏又說：

「……秦漢以還，中原板蕩，文物無存，學人莫窺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談性理，於是我墜於虛，彼徵諸實。不知虛中有實，實者道也；實中有虛，虛者器也。合之則本末兼賅，分之乃放卷無具。」（註三）

作者如能就相應於「道」「器」的其他觀念加以進一步分析，當可更深入的觀察鄭氏有關變法範疇的基本態度。

（4）、鄭氏改革理論的最大特色在其以「重商」爲基本精神的變法思想，作者未就此點詳細討論：

鄭氏係買辦商人出身，其改革思想特別強調振興商務的重要性，認爲首要之務在由國家重商，亦即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政

府應視商如士，准許商人子弟就近應試，以登仕途，訂定商律保障商人及其商業活動，此點不僅對傳統抑商政策是一種具體的革新，而且是同光之際改革理論中唯一強調現代商人的功能的卓見。旅美學者郝延平指出，鄭氏是近代中國給商人階級在意識形態上「合理化」的第一位商人（註四），這也正是作為買辦出身的改革論者鄭觀應的基本特色所在，作者未於文中就此詳細說明，實為一大缺憾。

此外，在制度的變革方面，鄭氏主張設立「商部」、「開銀行」，但作者均隻字未提。據近人指出，中國最早為文申論設立銀行的重要性並積極呼籲的知識分子可能是鄭觀應（註五）。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以前，鄭氏即力主仿照西法，創設國家銀行與私人銀行，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盛宣懷奏設中國銀行，其制度幾全同於鄭氏所議，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正式開辦，此即中國有西式銀行之始。（註六）此外，光緒廿九年（一九〇三）清廷增設「商部」，總理全國商務事宜，鄭氏請設商部的建議於焉實現，在思想先覺的意義上，鄭氏這兩個主張均有重大的價值，似不宜略而不談。

(5)、作者未就鄭觀應在清末商界的活動討論鄭氏「行動」與「思想」融合的情形：

清末，鄭觀應在商界的地位以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在「廣州商務總會」與「廣州拒約會」的活動最值得注意。光緒卅一年春，鄭氏被公舉為「廣州商務總會」協理，是年冬，鄭氏邀集廣東全省紳商會議，創辦廣州上下工藝院有限公司，不久即集資二十餘萬元，稟准兩廣總督岑春煊，撥「增步離明院」作為工藝院地基。同年八月，鄭氏被公推為「廣州拒約會」主席，領導對美貨的杯葛行動，以抗議美國禁止華工入美的規定。「廣州拒約會」係一抵制美貨的民間組織，廣受當地商界與學界之支持，翌年（光緒卅二，一九〇六）之抵制日貨運動即此一行動之延長（註七）。作者對鄭氏的這些活動略而不論，顯然忽視了思想家行動與思想是否融合及如何融合的問題。

(6)、作者討論鄭觀應的變法思想，僅述及民族經濟發展問題與鄭氏對議會制度君主立憲的態度，而有關鄭氏在吏治、外交、國防、社會政策、交通建設、科學與教育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則均略而不論，因此讀完全文，仍不能見鄭氏變法思想之全貌，且無法據以衡量鄭氏在整個晚清變法思想中之份量。

(7)、關於鄭觀應改革變法思想的影響：

作者認為鄭觀應前承龔自珍、魏源、馮桂芬的影響，後啓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之思想。光緒皇帝讀過「盛世危言」，曾令譯署印刷，分送政府官員閱讀，最後作者學晚清小說「官場維新記」的內容為例，說明盛世危言是維新分子的必讀之書，以證其書流傳之廣，影響之深。實則國父孫中山先生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上李鴻章書中指出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與鄭觀應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盛世危言自序中說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暢其流」幾乎完全相同，國父受了鄭氏的影響，今人論者頗多，幾已成為定論。（註八）此外，毛匪澤東亦自述其幼年讀鄭氏著作，

深受啓發，是鄭觀應對毛氏的影響亦極為明顯。（註九）然而對於前者，作者則置於文中第四小節討論，認為孫鄭二人的思想「交互影響」（頁一六至一七），似乎有為賢者諱之意。至於後者，作者或由於政治顧慮，或由於參考不週，則隻字未提。

關於盛世危言對清季維新思想的影響，鄭氏於刊印盛世危言後編時，曾自述曰：

「人過市上，便詢呂覽之編。客到枕邊，競索王充之秘，而尤以盛世危言前編為最著。」（註一〇）

光緒末年，時人亦曾指出：

「盛世危言皆闡明中外政治得失，聞各省書坊輾轉翻刻，已售至十餘萬部之多，早識先幾，朝野稱賞。」（註一一）可以證明盛世危言流傳之廣，與其舉「官場維新記」為例，不如比照鄭氏自述與時人談論來得真切。

(8)、關於鄭觀應的生卒年代問題：

作者認為，鄭氏「大約生於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死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四）以後」（頁四）。鄭氏的卒年，據胡秋原「鄭觀應生平及其思想——重印盛世危言緣起」一文，鄭氏於民國十二年逝世於澳門（註一二），增訂盛世危言正續編卷首並附有「待鶴老人八十小影」，是鄭氏卒於民國十年以後可以確定，郝延平亦採此說，認為鄭氏卒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註一三）。而本文作者却稱鄭氏卒於民國十一年以後，不知所據何書，對照西曆，民國十一年應為一九二二年，並非一九二四年，恐係手民誤植。

四、結語

綜而觀之，本文雖有不少疏漏之處，值得進一步深入討論，唯就整體而言，作者試圖以鄭觀應為核心，分析其前後代表性思想家的改革理論，以顯示晚清改革思想演變與影響的脈絡，條理相當分明，文字簡潔易讀，在學界迄無有關鄭觀應研究專書問世的今日，本文較為通俗的寫作體例應可引發廣大讀者的閱讀興趣，有助於一般人對鄭氏思想的認識；而就史學界言，若能因此促成一部論析鄭觀應思想的學術專著早日問世，亦未嘗不是後學的幸事。

附註

註一：范振乾，「鄭觀應的改革理論（一八六〇—一九一一）」（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六六年六月），頁五三至五六，鄭氏改革理論演變的分期。

註二：鄭觀應，盛世危言正續編（台北，學術出版社影印，民五四年十一月），卷一，頁一下，道器。

註三：同前註。

註四·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05.

註五·范振乾，頁一八〇。

註六·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民六五年六月，台北），頁五五至五七。

註七·參閱范振乾，「鄭觀應的改革理論（一八六〇—一九一一）」，頁三〇六，鄭觀應簡譜。

註八·參閱胡秋原，「鄭觀應生平及其思想——重印盛世危言緣起」（刊於前引盛世危言正續編卷前），頁一〇至一一。

註九·Hao, P. 222.

註一〇·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台灣大通書局影印，民五八年一月），頁一七。

註一一·同前書，頁四八九。

註一二·胡秋原，「鄭觀應生平及其思想——重印盛世危言緣起」，頁一至二。

註一三·Hao, P. 34.